

DOI:10.13718/j.cnki.xdsk.2017.03.001

专题:中国传统美学

顺天 富民 乐居

——《管子》的环境美学思想

陈望衡,郝娉婷

(武汉大学 城市设计学院,湖北 武汉 430072)

摘要:《管子》的环境美学思想主要体现为两个和谐: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。在人与天地(自然)关系的处理上,《管子》一方面提出人与自然相分,自然是客观的,人必须尊重它,依顺它,而不能违背它;另一方面,它又强调人与自然相合,人要善于用好自然规律,让自然为人类提供财富。二是人与人的和谐,它提出“人与人相保”“家与家相爱”“居处相乐”的重要思想。《管子》关于环境的认识建立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,更多地从农业生产的角度谈环境。《管子》同时也很重视环境与富民强国的关系,将善待环境看作是富民强国之道。《管子》的环境美学思想,体现出鲜明的农业文明色彩与家国情怀。

关键词:《管子》;环境美学;和谐

中图分类号:B22;B834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673-9841(2017)03-0005-08

《管子》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,较之儒道等学派,管子以及他所创立的学派更注重国家与社会的治理。民富国强可以说是《管子》思想的主题。它的环境观包括环境审美观是民富国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春秋时期,农业已经成为中国主要的生产方式,基于此,《管子》环境观具有浓厚的农业文明特色。《管子》从农业生产的需要出发,强调人必须尊重自然,善待自然,用好自然,与自然建构起一种友善的关系,让自然为人类奉献出更多的财富。《管子》基本上不去谈环境独立的审美意义,它的环境审美观建立在环境功利观基础上,是环境功利创造了环境审美。《管子》提出“民富以亲”的观念,让百姓在富起来的基础上懂礼义,然后构建社会和谐。

一、“尽天地之道”

《管子》中有“天地”这一概念,天地作为一个整体概念,为宇宙之总称。

天地万物之橐。宙合有橐天地。天地苴万物,故曰万物之橐。宙合之意,上通于天之上,下泉于地之下,外出于四海之外,合络天地,以为一裹。散之至于无间,不可名而山(疑为止)。是大之无外,小之无内,故曰:有橐天地。^[1]宙合第十一, p63-64

这话最重要的观点是提出“宙合”这一概念,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建立在“天地万物之橐”的基础上的。这一概念的提出奠定了天地作为环境的性质。

第一,宙合,强调天地是万物之橐。

“天地万物之橐”这一说法与《老子》有类似之处。《老子》说:“天地之间,其犹橐籥乎?虚而不

收稿日期:2017-02-21

作者简介:陈望衡,文学博士,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,教授,博士生导师。

基金项目: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“中国古代环境美学史研究”(13&ZD072),项目负责人:陈望衡。

屈,动而愈出。”^{[2]443}但老子没有强调橐的意义,强调的是天地虚与动的性质。

天地作为万物之橐,说明它是物质的,这将万物囊括在内与环境的第二义——“环人之境”是切合的。天地不只是将人囊括在内,也将万物囊括在内,这万物中除了人有生命外,还有动物植物有生命。因此,天地不仅是人之橐,也是动物和植物之橐,一言以蔽之,它是生命之橐。

第二,宙合,强调天地是无限的。

上面的引文中,《管子》将天地推至于无限,说它“其大无外,其小无内”,实际上提出了宇宙的无限性问题。

环境有没有无限的意义呢?这就要看人们的视界了。环境是可以按视界大小分成无数个层次的。按联系的观点,天地界诸事物都是有联系的,只是有些为直接联系,有些为间接联系,有些联系重要,有些不重要。

就人与环境的联系的重要性来说,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又是有所区别的,大体上,就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而言,受影响的“人”一般限于个体,或相对有限的群体。而就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而言,受影响的“人”就不限于个体了,小而言之,它是某一个地区的人,大而言之,是人类。

《管子》认为天地“其大无外,其小无内”,这说明它的环境观更多地趋向于自然环境观。这种环境观对于全球化的今天尤其有参考价值。

第三,宙合,强调在天地中生存的人处事有“当”与“不当”的区别。

《管子》说:

多内则富,时出则当。而圣人之道,贵富以当。奚谓当?本乎无妄之治,运乎无方之事,应变不失之谓当。变无不至,无有应当,本错不敢忿,故言而名之曰宙合。^{[1]宙合第十一,p64}

宙合的理论其要义是什么呢?《管子》提出“当”。《管子》拎出一个“富”字与“当”相配。当不是富的反义词,但富未必得当。富而不出,这富就不当了。《管子》认为“圣人之道”,贵在“富以当”,既富又当。《管子》已经意识到,天地之所以生生不息,充满活力,就是因为它有进有出。于此,它提出“当”的定义:“本乎无妄之治,运乎无方之事,应变不失之谓当。”这一定义提出三个重要概念:“本”“运”“应变”。“本”的是“无妄”。“无妄”即真实,可以理解为真理。“运”的是“无方”,“无方”即没有定准,可以理解为新情况。将真理用到新情况,是“运”。整个过程是“应变”。应变要做到不失,才能称作“当”。

三个概念的提出,在《管子》中有一个基本的认识:“天不一时,地不一利,人不一事。”^{[1]宙合第十一,p62}“不一时”,说明它是有“时”的。有时即有规律,但规律不是死板的,它的表现形式总是不同的,这就叫“不一时”。正是因为这样,人们就要“不一事”,即善于根据规律的不同表现形式而从事相应的活动。《管子》“宙合”说的结论是:“……夫天地一险一易,若鼓之有桴,撻挡有击。言苟有唱之,必有和之,和之不差,因此尽天地之道。”^{[1]宙合第十一,p63}

《管子》提出“和”这一重要概念,这里说的“和”,原是音乐之和,用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,强调人与天和。这里的人与天和,就是“尽天地之道”。只有尽天地之道,才能达到在天地间成功地生存与发展的目的。

“本”“运”“应变”这三个概念概括了人在环境中生存发展的基本法则,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,就是用之今日,也是可贵的。

二、“务在四时”

在《管子》中,环境与资源这两个既有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概念是叠合在一起的。它们对于人的意义在于它是人的生存之本。《管子》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来看环境。从时间维度看环境,《管子》重视“时令”对于农业生产的意义。

《管子》首篇为《牧民》,“牧民”之要,“务在四时”。《管子》说:“不务天时则财不生。”^{[1]牧民第一,p1}这

里包含有两层重要的意义：第一，不是消极地待时、守时，而是积极地“务时”，即用时。第二，强调时为“天时”。“天”，一方面说明“时”是指节气，另一方面强调它的客观性、神圣性。这是上天的意旨，是不可违背的。

重视“时”，在先秦哲学中不独《管子》。《周易》就很重视“时”。《周易》云：“与时偕行”“与时偕极”^{[3]乾卦文言，p28}，“君子藏器在身，待时而动，何不利之有？”^{[3]系辞下传，p153}显然，《周易》重视“时”，主要取哲学维度，指条件。《管子》谈“时”，主要不是谈条件，而是谈时令，它将“务时”提升到富民强国的高度：

凡有地牧民者，务在四时，守在仓廩。国多财则远者来，地辟举则民留处。仓廩实则知礼节，衣食足则知荣辱。^{[1]牧民第一，p1}

这里，它特别强调“仓廩实则知礼节”，将经济认定为意识形态的基础，富民为先，礼民为后，也许理论上不够完备，但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，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。

既然“时”有这样重大的意义，如何务时？《管子》提出几点：

首先，要“知时”。知在务之先，知是务的前提。《管子》曰：“道曰：均地，分力，使民知时也。民乃知时日之蚤晏，日月之不足，饥寒之至于身也。是故夜寝蚤起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，为而不倦，民不惮劳苦。”^{[1]乘马第五，p16}像“夜寝早起”这样的生活规律，也是知时的产物。

知时，特别要明白“时”的不可停滞性。时是一维的，线性的，不可重复的。《管子》说：“时之处事精矣，不可藏而舍也。故曰，今日不为，明日忘货，昔之日已往而不来矣。”^{[1]乘马第五，p16}这里说“时之处事精”，“精”在哪里？精在不滞，藏不了，也舍不住。今日该做之事如果不做，明日来做就不是一回事了。

特别要注意的是，《管子》谈“时”的一维性，立足于“货”，即时间创造财富的立场。它不是在谈“时”的形而上学，而是在谈“时”的形而下学。

其次，要“合时”。知时的目的是用时，用时的关键是合时，如果不合时，其用必败。《管子·幼官第八》于这方面有非常充分的论述。试摘一段：

春行冬政肃，行秋政雷，行夏政阍。十二地气发，戒春事；十二小卯，出耕。十二天气下，赐与。十二义气至，修门闾。十二清明，发禁。十二始卯，合男女……八举时节，君服青色，味酸味，听角声，治燥气，用八数，饮于青后之井，以羽兽之火爨。藏不忍，行驱养，坦气修通。^{[1]幼官第八，p38}

这段话中心思想是要按照时令做事。春夏秋冬时令不同，各有其政，一点也不能乱。如果春天不是行春令而是行冬令，那么万物肃杀；行秋令，则大地现霜；行夏令则炎热难耐。这季节就乱了。《管子》详细地说明不同的时令要做不同的事。它说，从初春开始，第一个十二天后，为“地气”发，要准备春天的事了；第二个十二天后为“小卯”，要出耕了；第三个十二天后为“天气下”，适宜赏赐了；第四个十二天后为“义气至”，要修门闾了；第五个十二天后为清明，要开放禁令了；第六个十二天后为初卯，男女可以结婚了……

时令的不同显示出自然界的状况不同，自然界的状况影响着人的生活，人只有与时令取同一步调，才能身体健康。《管子》这里特别说到春天即“八举时节”的养身问题。按五行说，八为木气，木气为春天之气。“八举”，即木气扬举，说明春天到了。《管子》说春天时节，君王要服青色，吃酸味，听角声，治燥气。另外，喝的水、烧饭用的柴均有一定的讲究。还要注意养心，乐善好施，让心境平和通达。

《管子》说：“凡物开静，形生理。”^{[1]幼官第八，p38}“物开静”的意思是物按自己的本质存在着；“形生理”是说形按照理形成着。一切都是自然规律在作用，在决定，物只是规律的现实显现罢了。

《管子》进一步将“合时”提升到哲学的高度，并将这种哲学用于做国家大事。它说：“春采生，秋采蓂，夏处阴，冬处阳，大贤之德长。明乃哲，哲乃明，奋乃苓，明哲乃大行。”^{[1]宙合第十一，p59}

《管子》概括春秋夏冬四时对于生命的不同意义，强调贤德之人务必要遵时、务时。这种遵时、

务时,就是“明”,也是“哲”。只有“明哲”才有“大行”。《管子》的“大行”,就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。这里明显地体现出天人合一的哲学精神。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,各家各派均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自己的天人合一观。儒家的天人合一观更多地侧重于人的精神修养层面;而《管子》天人合一观则更多地侧重于人的各种实践特别是农业实践层面,将其提升到国计民生的高度。

三、“地者政之本也”

从空间维度看环境,《管子》认为环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土地上。

重视地,这是中国古代环境美学思想的突出特色。《周易》可以说发其端。《周易》六十四卦,开头两卦,一为乾,二为坤,乾为天,坤为地。乾虽然位于坤之先,但乾更多地具有宇宙总体规律的意义,而坤则更多地指称实实在在的大地。《周易》对于地的赞颂,核心意义是“地势坤,君子以厚德载物”^[3]坤卦象传,p31,显然强调的是地的哲学价值特别是道德价值。

《管子》也非常重视地的价值,但它对于地的价值的重视,并不着重于它的哲理性,而在于它的现实功能性,其基础功能是农业之本。

据地下考古,中国农业的历史大约有 12 000 年了。距今 8 000 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第四期发现有大量的稻谷、稻秆、稻叶的遗存。此处遗址发现有农具耒,陶器上有猪纹饰,充分说明此时农业已相当发达了。周代以国家名义确定下来的大祭中,就有名之为“社”的土地神祭祀和名之为“稷”的对谷神的祭祀,“社稷”后来成为国家政权的代称。

《管子》对地的认识,其深刻之处不仅在于它认识到地为民之本,也是国之本,而且在于它认识到种地的法则也可以移用到治国。《管子》提出一个重要观点:“地可以正政”。《管子》说:

地者政之本也,是故地可以正政也。地不平均和调,则政不可正也。政不正,则事不可理也。春夏秋冬,阴阳之推移也。时之短长,阴阳之利用也。日夜之易,阴阳之化也。然则阴阳正矣,虽不正,有余不可损,不足不可益也。天地莫之能损益也。然则可以正政者地也,故不可不正也。正地者,其实必正。^[1]乘马第五,p13

“正政”即端正政治,谁可以端正政治?“地可以正政”。此是主观点,下分为两个小观点:第一,土地分配不合理,管理不良善,国家的政治就不可能端正。第二,天象变化是阴阳推移之结果,阴阳变化一般是正常的,即使有时不正常,多余无法减少,不足亦无法增加。人对于天象的变化是无能为力的,然而可以用来整治国政的土地,人是不能不去加以整治的,它必须正。而且,人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调整它。

对于“地”如何“正”,《管子》有两个重要观点:第一,因地制宜。《管子》说:“因天材,就地利,故城郭不必中规矩,道路不必中准绳。”^[1]乘马第五,p13 这句话是说筑城修路的,《管子》认为筑城不必中规中矩,修路也不必强调要修得平直,一切凭依“天材”即自然条件,要将就“地利”即地理状况。这“因天材,就地利”不独用在筑城修路上,还可以用在人的一切与自然相关的活动中。

第二,以道待物。

天涓阳,无计量;地化生,无法崖。所谓是而无非,非而无是,是非有,必交来。苟信是,以有不可先。规之,必有不可识。虑之,然将卒而不戒。故圣人博闻多见,畜道以待物,物至而对形,曲均存矣。^[1]宙合第十一,p59-60

《管子》说,天培育生命,无法计量;地化育生命,没有穷尽。所谓是,就不能说成非;非也不能说成是;是非不能分离,有是必有非,有非必有是,是非相交而来。如果相信这一点就会明白,这世界的变化,必定有超出常规的地方,有人们没有思虑到的地方,人们不能不有戒备。

怎么戒备呢?《管子》提出两点:一是博闻多见,用知识和经验处置那些新的事物。二是“畜道”。道是天地的根本规律,是智慧。畜道,就是培植畜养提升智慧。这样,新事物来到,知识用不上,经验也用不上,就用智慧好了。智慧可以处置新事物。

虽然《管子》重视地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作用,侧重于地的实用功能,但《管子》并没有忽视地对于人的思想启迪功能,它说:“理国之道,地德为首。”^{[1]问第二十四,p149}这样,它与《周易》对地的歌颂实现了合流。但是,《周易》所歌颂的主要是地的道德启迪功能,而《管子》所歌颂的主要是地的“理国”启迪功能。

四、“顺天者天助之”

与儒家一味强调自然亲人观不同,《管子》强调自然是客观的。所谓客观的,主要在于它有自身的规律性,这种规律性,《管子》名之曰“常”:

山高而不崩,则祈羊至矣;渊深而不涸,则沉玉极矣。天不变其常,地不易其则,春夏秋冬不更其节,古今一也。蛟龙得水而神可立也,虎豹得幽而威可载也,风雨无乡而怨怒不及也,贵有以行令,贱有以忘卑,寿夭贫富无徒归也。^{[1]形势第二,p3}

这段话的核心是天有常,地有则。常、则均是规律义。规律是客观的,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与这一核心观点相关,还有三个观点:

其一,“蛟龙得水而神可立也,虎豹得幽而威可载也”。蛟龙的神,是不能离开水的,无水哪里有蛟龙之神灵?虎豹的威是不能离开丛林的,无丛林,虎豹的威将何以显现?这里,虽然举的是例子,说明的却是一个普遍性的规律,任何事物都是在关系中得以成立的,离开关系,事物不予成立。

其二,“山高而不崩,则祈羊至矣;渊深而不涸,则沉玉极矣”。这是说人的自然崇拜的由来,人之所以崇拜山,烹羊以祭,是因为山高而不崩;之所以崇拜渊,献玉而祭,是因为渊深而不涸。而人自愧诸多方面不及自然,因而怀有谦卑之心,能敬畏自然。

其三,“贵有以行令,贱有以忘卑,寿夭贫富无徒归也”。这说的是人,人应该明白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与意义,做自己该做的事。像君,虽贵,但不能一味贪图享受,而应负起责来,推行政令;像百姓,虽贱,但不能一味忍卑守辱,而应忘却卑辱,奋发有为。总结起来,“寿夭贫富无徒归也”。人要想改变自己的寿夭贫富状况,是可以在客观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做出诸多努力的。

在肯定大自然具有自身规律性的基础上,《管子》强调按自然规律办事,要彻底地奉行天道:

天道之极,远者自亲;人事之起,近亲造怨。万物之于人也,无私近也,无私远也。巧者有余,而拙者不足。其功顺天者天助之,其功逆天者天违之。天之所助,虽小必大;天之所违,虽成必败。顺天者有其功,违天者怀其凶,不可复振也。^{[1]形势第二,p3}

这段话最为精粹地阐明了《管子》的天人观:

第一,天与人本是相分的。《管子》说:“万物之于人也,无私近也,无私远也。巧者有余,而拙者不足。”《管子》认为,天地万物于人是没有什么情感的,既不会因爱而特别近之,也不会因恨而特别远之。万物不是因人而生存着,而是因自己的本性而生存着的。如果将万物归之于天,那这里的天与人是相分的。

第二,天与人是可以相合的。天与人虽然是相分的,而且天不需要去合人,但是人需要去合天。如何合?——顺天。人为什么要顺天?因为顺天天助之;而逆天天违之。《管子》在论及天与人的关系问题上,持的是唯物主义立场,它坚定认为天——自然是第一性的,人是第二性的,不是天要合人,而是人要合天。这一观点是进步的,在当今的生态文明建设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五、“以天下为天下”

关于人在天地中的活动,《管子》有诸多论述,除了“顺天”以外,它还提出“以天下为天下”的重要观点:

以家为乡,乡不可为也;以乡为国,国不可为也;以国为天下,天下不可为也。以家为家,以乡为乡,以国为国,以天下为天下。毋曰不同生(姓),远者不听;毋曰不同乡,远者不行;毋曰不

同国,远者不从。如地如天,何私何亲?如月如日,唯君之节。^[1]牧民第一,p2-3

为什么以“以国为天下,天下不可为也”?《管子》是将“国”与“天下”严格地区别开来的。国是国,天下是天下,这正如家是家,不是乡;乡是乡,不是国。以治家的办法去治乡,以治乡的办法治国,肯定不行;同样,以治国的办法治天下也肯定不行。《管子》这一说,显然与儒家的观点不一样。儒家认为,治家与治国在道理上是相通的,所以,治好家就能治好国,而治好国也必须治好家。

《管子》与儒家思想的这种对立涉及世界观。世界上存在着诸多事物,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,大体上可以按两种维度来认识:一种维度是认识到它们之间是相通的,由相通,可以进一步认识到,它们也可能存在着某种相同之处。故而可以将对待某物的办法移到与它相类相似的另一物上去。儒家持的是这种维度。另一种维度是认识到它们之间是相分的,各自具有自身的独立性,不能以对待此物的办法对待彼物。《管子》持的是这种维度。客观地说,两种看待事物的维度都有其深刻性,但都有其片面性。

《老子》中有一段话与《管子》相似。《老子·第五十四章》云:“故以身观身,以家观家,以乡观乡,以邦观邦,以天下观天下,吾何以知天下然哉?以此。”^[2]第五十四章,p273 细加比较,我们可以发现,《管子》的“以家为家,以乡为乡,以国为国,以天下为天下”与之完全不同。

其一,《老子》讲的是“观”,属于认识;《管子》讲的是“为”,属于实践。认识与实践不是一回事。老子说的“以家观家”,是认识,这种推理之所以得以成立,是因为事物具有类同性。《管子》说的“以家为家”,是实践,之所以不能“以家为乡”,是因为家与乡是不同的,不同的对象只能按不同的方法来处理。

其二,《老子》说“以家观家”立足点是事物的普遍性,强调从同的方向看事物;《管子》的“以家为家”立足点是事物的差异性,强调从异的方向看事物。

结合到治国,《管子》强调公正无私,“毋曰不同生(姓),远者不听;毋曰不同乡,远者不行;毋曰不同国,远者不从”,这听与不听、行与不行、从与不从,不是看对象与自己是不是同姓、同乡、同国,而是看它说的是不是有理,是不是可行。

“如地如天,何私何亲?如月如日,唯君之节。”这便从天地无私推出治国无亲。《管子》的治国理念明显地近于法家而偏离儒家。

六、“正定万物之命”

《管子》非常看重“正”这个概念,前面我们谈到过,在处理政与地的关系时,它强调“地是政之本”,地可以“正政”。其实,不只是处理政与地的关系要正,处理一切事务都要正。其中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“正定万物之命”的命题:

政者,正也。正也者,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。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,明正以治国。故正者,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。过与不及也,皆非正也。非正则伤国一也。勇而不义伤兵,仁而不法伤正。故军之败也,生于不义;法之侵也,生于不正。故言有辩而非务者,行有难而非善者。故言必中务,不苟为辩;行必思善,不苟为难。规矩者,方圆之正也。虽有巧目利手,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圆也。故巧者能生规矩,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。虽圣人能生法,不能废法而治国。故虽有明智高行,倍法而治,是废规矩而正方圆也。^[1]法法第十六,p@1-92

“正”在《管子》中是一个核心概念,它的本质是“正定万物之命”。何谓“万物之命”?“命”在这里是本性义,物均有自己本性,这本性是物得以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根据。作为万物之灵的人,有一定的能力破坏、干扰他物之性。但是,从维持全球的生态平衡来说,人必须尊重他物之性,切忌为了人的眼前利益而破坏整个地球的生态平衡。

“正定万物之命”中的“正”的理论前提是尊重万物生命,尊重生态平衡,尊重宇宙规律。在这个前提下,人的行为方式是多种多样的,他可以以积极的态度,主动参与自然界的生态平衡,实现生态

与文明的共生；也可以以消极的态度，将人改造自然的规模缩小，让自然有足够的喘息时间，凭自我之力，恢复生态平衡。

《管子》在“正”之后，加上“定”字，“正”且“定”，这是有深意的。它强调对于万物之命的尊重，不能只是权宜之计，而应该是长期且坚定的，具有战略的意义。

由于当时的自然生态并没有遭遇现今这样严重的问题，因此《管子》的“正定万物之命”并没有朝着维护自然生态平衡的方向发展，而是朝着维护人生生态平衡和政治生态平衡的方向发展。就维护人生生态平衡来说，它提出“精德立中以生正”；就政治生态平衡来说，它提出“明正以治国”，并且朝着立法的方向发展。最后归结为“规矩”，而规矩为“方圜之正”。

关于“规矩”与“巧”的关系，《管子》有两个重要观点：第一，“虽有巧目利手，不如正规矩之正方圜也”。规矩的作用是决定性的，人工的作用不能与规矩比。第二，虽然人工之巧不能与规矩比，但是，“巧者能生规矩”。《管子》讲的规矩还不能视为规律本身。规律，人是不能立（生）的，但是规矩人可以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规矩虽然是人立的，但不能按照人的意旨立，而只能是按照自然规律立。不是任何人都能立规矩的，只有人之中的“巧者”才能立规矩。“巧”在哪里？巧在正确地认识规律并且善于利用规律。

《管子》这一系列理论，对于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。在决定人类命运的问题上，虽然人的智慧也能起到一定作用，但人的作用不能与自然的作用比。就此而言，“虽有巧目利手，不如正规矩之正方圜”。但是，人也不是消极地接受自然裁决的，人可以凭借自己的智慧（巧）正确地认识自然规律，并很好地利用自然规律，在这个基础上，为自己的行为建立起规矩，从而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，以争取美好的未来。

七、“正天下之本”

“地大国富，人众兵强”是《管子》的社会理想，也是它的环境美学的集中表达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富强的大国不是没有顾忌的，而是有所顾忌的，顾忌在于富强的大国仍然存在有危亡的可能性。《管子》说：

地大国富，人众兵强，此霸王之本也。然而与危亡为邻矣。天道之数，人心之变。天道之数，至则反，盛则衰。人心之变，有余则骄，骄则缓怠。夫骄者，骄诸侯。骄诸侯者，诸侯失于外。缓怠者，民乱于内。诸侯失于外，民乱于内，天道也。此危亡之时也。若夫地虽大，而不并兼，不攘夺；人虽众，不缓怠，不做下；国虽富，不侈泰，不纵欲；兵虽强，不轻侮诸侯，动众用兵，必为天下政理，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。^[1]重令第十五，p81-82

为什么“地大国富，人众兵强”却与“危亡为邻”呢？《管子》认为根据有二：一是天道之数，二是人心之变。天道之数即自然规律，这规律中有重要的一条，那就是“盛则衰”。这种物极必反的规律，《周易》论过，《老子》论过，《管子》又加以论之。人心之变主要讲“有余则骄，骄则缓怠”，这就有可能出事了。《管子》提出“四戒”“四不”：戒贪，戒骄，戒怠，戒奢；地大而不并兼，人众而不缓怠；国富不侈泰，兵强而不欺弱。

这样一种观念在当今生态文明建设事业中具有重大意义，它启示着人类：要力戒贪欲，对自然掠夺要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，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，掠夺所导致的生态失衡将反转来祸害人类。要力戒骄傲，人并非万物之灵长，天之骄子，人与万物在生态平衡意义上是平等的。要力戒缓怠，要居安思危，人类靠掠夺自然所获得的文明成果并不稳固，人类要继续努力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平相处。这其实也可以看作是“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”。“本”为生态平衡，“霸”指人在这项事业中的主导作用。

八、“定民之居”

《管子》的主旨是讲如何治国，而治国的主题是如何让社会和谐、百姓安定、生活富裕。概括起

来说,就是建立一个美好的环境。《管子》用“定居”作为环境审美的概括。关于“定居”,《管子·小匡第二十》做了详尽的论述,择其要者,大致有:

第一,得其职所:人民各有其最能实现自身价值的社会环境。《管子》说:“士农工商四民者,国之石民也。不可使杂处。杂处则其言哢,其事乱。”^{[1]小匡第二十, p121}意思是,知识分子、农民、工人、商人是国家的柱石,不能让他们杂处在一起。杂处在一起,就会胡乱地说话,胡乱地做事。那么,该怎样安排这四种人民呢?《管子》说:“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(据郭沫若考证,“闲燕”为“闾黄”之误,闾黄为学校),处农必就田野,处工必就官府,处商必就市井。”^{[1]小匡第二十, p121}这就是说,知识分子应在学校里教书,农民应在田野劳作,工匠应在官府里干活,商人应在市场交易。这一说法概括起来就是各得其所。

第二,安心工作:人民各自从事自己的职业积久而心安。《管子》分别论述士农工商四民的职业。士人从事教育工作:“旦昔从事于此,以教其子弟。少而习焉,其心安焉,不见异物而迁焉。”^{[1]小匡第二十, p122}农民从事农业劳动:“沾体涂足,暴其发肤,尽其四支之力,以疾从事于田野。少而习焉,其心安焉,不见异物而迁焉。”^{[1]小匡第二十, p121-122}工匠从事制器工作:“相良材,审其四时,辨其功苦,权节其用,论比计,制断器,尚完利。相语以事,相示以功,相陈以巧……旦昔从事于此,以教其子弟。少而习焉,其心安焉,不见异物而迁焉。”^{[1]小匡第二十, p122}商贾从事商贸工作:“旦昔从事于此,以教其子弟。相语以利,相示以时,相陈以知贾。少而习焉,其心安焉,不见异物而迁焉。”^{[1]小匡第二十, p122}

第三,社会和谐。《管子》说,虽然各色人等均有自己的工作,也均有自己的职场,但在生活中还有诸多交集,在这些交集中,要做到和谐相处。它的具体描述是:

人与人相保,家与家相爱,少相居,长相游,祭祀相福,死丧相恤,祸福相忧,居处相乐,行作相和,哭泣相哀。^{[1]小匡第二十, p123}

这种生活状况称得上和居了。由定居到安居,再到和居,《管子》清晰地表达了他的社会思想。在他看来,能让百姓定居、安居、和居的环境就是美好的社会。这里还提出“居处相乐”,实际上已经提出“乐居”理念了。乐居是一个美学概念,它的含意很鲜明:人在环境中幸福地生活着。

《管子》的环境美学思想是中国古代环境美学的典型代表,与儒家、道家并立。这三家的环境美学思想都建立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,都以天人合一为指导思想,均不同程度地体现出环境与资源的统一、功利与审美的统一、自然与生态的统一的特色。但它们有着重要的区别:第一,对于自然价值的认识,儒家看重的是自然的道德比附及精神寄托的价值,道家看重的是自然作为宇宙精神本体——道的象征的价值,《管子》则更看重自然的生产资源与生活资源意义。第二,关于与环境相对的主体——人的认识,儒家的认识侧重于社会,道家的认识侧重于个体,《管子》的认识则侧重于国家。较之儒道,《管子》更重视强国,它的强国与富民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,而富民则建立在正确地处理好人与自然的 relationship 的基础上,让自然资源更多地转化为财富。《管子》的环境美学思想体现出浓重的家国情怀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管子[G]//诸子集成:第5册.北京:中华书局,1986.
- [2] 陈鼓应.老子注释与评介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4.
- [3] 周易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5.

责任编辑 毛兴贵

网 址: <http://xbbjb.swu.edu.cn>